

患无穷。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在伪兴安北省蒙古族部落里发生的鼠疫，一九四〇年在伪兴安北省三河附近发生的炭疽，都和日本细菌部队的活动有关。据调查，农安、辽阳、本溪、新民、哈尔滨、岔路河、泰来、白城子、洮南、东丰、双城、抚顺等地都有被撒播细菌的迹象。因此，在日本投降后，东北各地传染病流行，不能说与日本细菌部队的罪恶活动无关。一九四五年八月，长春市内、二道河子、宋家洼子传染病猖獗，多数全家死亡。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洮南、洮安、镇赉、开通四县鼠疫患者达四千三百余人，死亡一千四百余人。一九四六年，哈尔滨平房一带也因鼠疫死亡一百余人。霍乱更为猖獗，一九四六年，吉林省永吉县岔路河，每天死亡达三十人。一九四七年，齐齐哈尔、肇东、肇源、洮安、大赉、安广、镇赉、泰来、开通、瞻榆、洮南等地，霍乱患者达九千余人，死亡七千五百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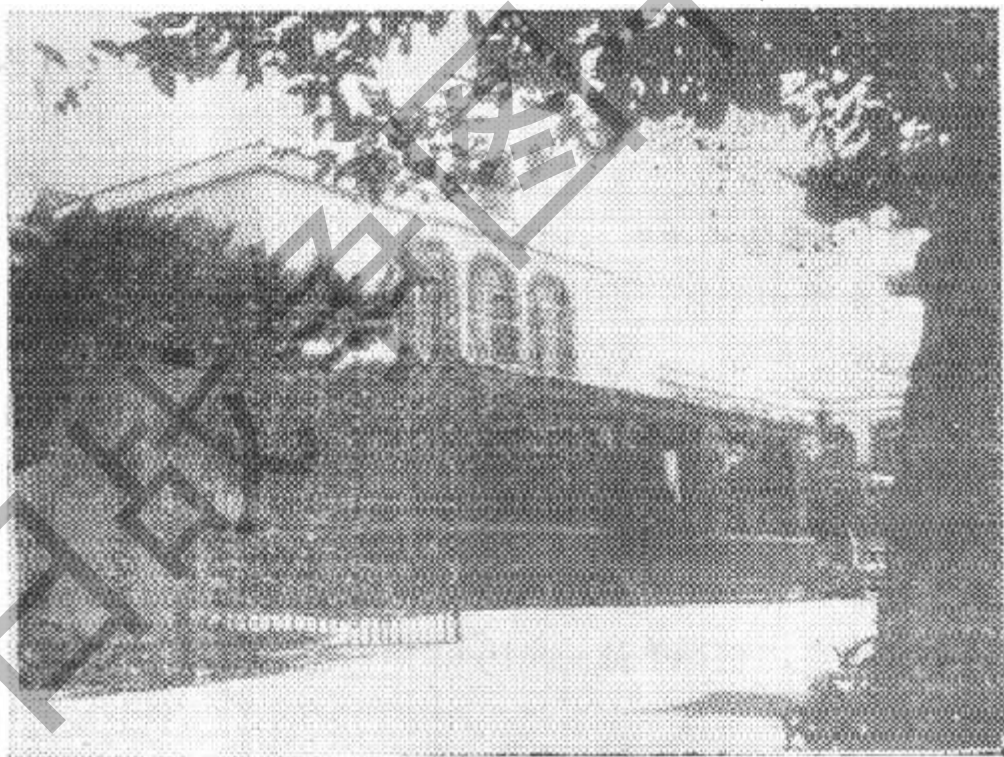
五、协 和 会

1 由 来 与 发 展

“九·一八”事变前，在我国东北的一小撮法西斯分子拼凑了积极鼓吹侵占“满蒙”的反动组织——满洲青年联盟和大雄蜂会，成员大部分是满铁社员。他们不但是发动“九·一八”事变、进行武装占领的吹鼓手，而且还是网罗汉奸制造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急先锋。专门为制造县一级伪政权而拼凑起来的所谓自治指导部，大部分成员来自上述两个反动组织。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政府成立后，自治指导部解散，一部分人员进入伪满各级政权，充当指导官等职务，控制各方面的大权；另一部分人员，如原满洲青年联盟成员山口重次、小泽开作等人开始筹划建立“统

一国民思想，进行思想战的全满统一的国民组织”^①。即在关东军石原参谋等人积极支持下，纠结同伙，着手建立协和党。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他们集合在奉天忠灵塔，举行了结党的宣誓。该党利用原青年联盟的组织系统，从满铁沿线伸张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迅速发展了自己的组织。他们以“宣抚”为名，紧紧跟随关东军，参加各种军事侵略和政治阴谋活动。《满洲协和党法》写道：建立协和党的目的是“振作建国精神，使施政畅达。”^②这是一个由伪满洲国豢养（《协和党法》规定，党的经费由伪满洲国负担，并使用伪满洲国提供的建筑物）的御用反动政党。

但是，关东军司令官极力反对“党”这个名称。因此，协和



协和会馆旧址

① 《满洲国史》各论，第7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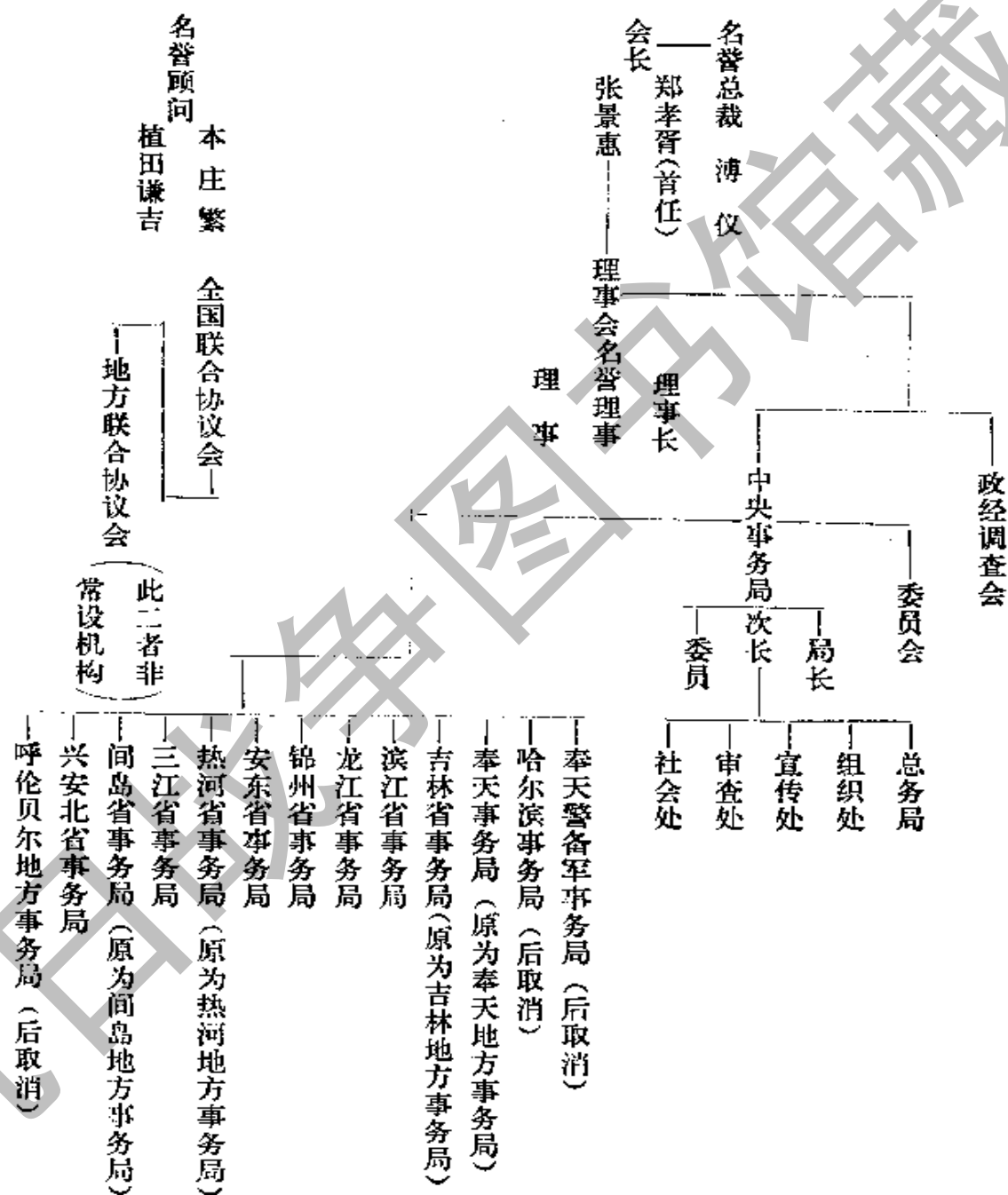
② 小山贞知：《满洲国协和会的发展》，第37页，日本中央公论社，1941年版。

党仅仅存在两个月即宣布废除。关东军认为，在当时那种抗日思潮日趋高涨的形势下，需要一个从思想上统治人民群众的所谓“思想的教化的国民组织”。于是关东军直接着手筹建协和会，由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实际主持，作为创立准备委员的则有：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片仓衷；伪满洲国的张燕卿、谢介石、于静远、阮振铎、小泽开作、和田劲、小山贞知、山口重次，等等。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在伪满执政溥仪、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及满铁、关东厅的头目参加下，于伪满国务院正式成立了协和会。溥仪任名誉总裁，本庄繁任名誉顾问，会长郑孝胥，理事长张燕卿，中央事务局长谢介石，次长中野琥逸。和原来的协和党一样，协和会的骨干中很多是青年联盟和自治指导部成员。

一九三四年九月，协和会实行改组。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阪谷希一次长兼任协和会事务局次长；协和会的其他头目，也几乎都由伪满政府的日本人官吏兼任。协和会中央部门部分地开始实行“二位一体”制，伪满政府与协和会实行“一体化”。同年十二月，南次郎任关东军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任关东军参谋副长，他们加强了对协和会的控制。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平岛敏夫任协和会事务局长。一九三六年二月，协和会中央事务局中设立以半田敏治为委员长的临时新京特别工作委员会，开始在各机关、公司组织协和会的分会。与此同时，在奉天的日本法西斯团体“大满洲正义团”宣布解散，四万三千名团员全部加入协和会。从这时起，协和会声言，它不单是一个民间团体，而俨然以伪国家机关自居。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即协和会成立四周年纪念日，协和会改称为“满洲帝国协和会”，伪满国务总理大汉奸张景惠任会长，井上忠也任中央本部长，平岛敏夫任总务部长。

关于协和会和伪满洲国的关系问题，关东军植田司令官在同年九月十八日，即“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发表的题为《满

协和会组织表 (一)
(成立——一九三六年七月)



洲帝国协和会的根本精神》的声明中说，协和会是“与满洲国同时产生的一种国家团体”，它“不是政府的附属机关，也不是与政府对立的机关，而是政府的精神母体。”“精神母体”者，即“建国精神”也，而“建国精神”，则被植田解释为“以实现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王道乐土、道义世界为理想的天皇的圣意。”这就是说，协和会首先是向广大中国群众灌输所谓“建国精神”的反动政治中心。植田还说：“政府是在建国精神即协和会精神上构成的机关，其官吏必须是协和会精神的最高最热烈的体现者。”^①曾任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的阪谷希一作过形象的比喻：

“将满洲国比做一件衣服，政府是面，协和会是里，相结合而成一件夹衣。”所以在《满洲帝国协和会章程》中，则把协和会写成为与伪满政府“表里一体”的组织。

协和会在宣扬其根本精神时，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提出了“万邦协和”的骗人口号。说什么“协和主义的最高理想”是要实现“万邦协和”，妄图以“协和主义”来“统一世界文化”，征服亚洲和世界各国民族。所以，从“民族协和”到“万邦协和”，都是侵略性的口号，其实质就是鼓吹“八紘一宇”“大东亚共荣圈”，以实现灭亡中国、称霸亚洲的狂妄目的。

2 屠杀与掠夺的别动队

日伪统治者把协和会说成是“建国精神”的“思想的、教化的、政治的实践组织”，是不错的。因为协和会确实不单是一个进行“王道乐土”“一德一心”“民族协和”之类欺骗宣传的机构，更重要是实现所谓“建国理想”的“实践组织”。

协和会首先是一支日本侵略军进行武装占领和日伪军警进行

^① 《现代史资料》11，续·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一九七二年版，第907页。

反革命大屠杀的特工队或别动队。一九三二年四月至五月，关东军第十四师团和第十师团在松花江下游围剿抗日武装力量。协和党根据关东军的要求，组成随军宣抚班，伙同关东军镇压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在哈尔滨以东到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东部线，派了第五、六、七、八等四个班；在松花江下游地区，派第一、二、三等三个班；在呼海、齐克线进行活动的协和党宣抚班是第九、十、十一、十二等四个班；此外在海伦、一面坡、呼兰也都增派了“宣抚员”。这些随军特务，由于处处与抗日武装力量为敌，有的遭到覆灭的下场。剩下的一批，在武力围剿之后留在各地，在关东军的指使下，拼凑伪农会、伪商会等组织，搜集情报，征发物资，充当日本侵略军的走卒，欺压中国人民。

在日军对“东边道”进行军事围剿和侵占热河地区的时候，协和会也进行了所谓“特别工作”。一九三二年五月，协和党与关东军相配合，建立了以山口重次为总指挥的“东边道特别工作机关”，安东的协和党支部任命伊藤辰雄等十二人，从事此项特别工作，另外还设立腹地侦察机关，担任情报搜集工作。后来，当武装围剿告一段落之后，协和会宣抚班一变而为协和会县办事处，与中国共产党对抗，进行反革命政治活动。一九三三年二月，关东军侵入热河时，协和会中央事务局次长中野琥逸率领协和会热河省事务局、兴隆县办事处、朝阳县办事处、隆化县办事处、围城县办事处等一些协和会人员，组成“宣抚班”，随同第九师团，进行大约半年时间的所谓“宣抚”工作。

协和会大肆进行反共活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协和会中央本部设立“排共特别委员会”，把“排共运动”作为“国民运动”来进行。一九三七年一月，协和会中央本部还设立青训指导委员会，妄图把青年训练为反共先锋。一九三七年，关东军在“治安肃正”名义下，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屠杀和镇压。地区是：伪吉

林省的舒兰、蛟河、桦甸、磐石、敦化各县；伪牡丹江省的宁安，和伪间岛、通化两省的全部。时间是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到一九四〇年末。这次武装镇压行动，日伪军警和协和会的特务组织了统一机构，即在“讨伐司令部”下设参谋部、宪兵部、警务部、行政联络部、最高检察联络部、协和会联络部、铁警联络部。协和会不但进行反共的思想宣传，而且从事策反招降，搜集情报，广泛进行各种政治阴谋活动。自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起，协和会通化省临江县和通化县本部还组成了青年行动队，即从该县协和会青年训练所毕业生中，选派四十人，参加“肃正”工作。为了从工人、农民中刺探出各种情报，他们化装混入群众当中，了解共产党的活动状况以及其他各种情报。当时，日伪军警宪特还酷使大量群众为“讨伐队”背送粮草，从事各种劳役。协和会青年队的人员便直接从事征召群众、逼迫群众和奴役群众的勾当。当时，“东边道”有些地区是我抗日联军的游击区，表面上是伪满洲国的基层行政单位，实际由抗联控制着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协和会青年队用各种手段同共产党争夺群众。一九四〇年以后，我八路军深入敌后，在冀察热辽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很大打击。因此，在伪满洲国的最后几年，以热河为中心的所谓西南地区便成了“治安肃正”的重点。于是，在通化一带活动的青年行动队，也跟随日伪军警进入热河地区，分成两个队，进入滦平和兴隆两个县。他们这次行动是离开军队，自行武装，搜集情报，争夺群众，打击我地下抗日力量。当时，我八路军以长城以南为根据地，伺机对热河地区进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斗争。在这里，青年行动队配合日伪军警的武力围剿，积极进行与八路军争夺居民的“思想战”，并组成了所谓“协和灭共青年队”。

协和会的反共活动，不限于军事镇压期间和那些地区，也不

完全是作为从属,配合日军行动。就在一九三六年底,协和会中央本部即设有“排共特别委员会”,进行有组织的反共活动。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又向抗联比较活跃并与苏联接壤的伪三江省派遣协和会的工作队。并且,在协和会企划局内,研究对苏思想战的方案,召开对苏思想战规划会议。此外,还组织对苏思想战人员训练班,然后向边境分配,从事阴谋活动。

协和会是日本帝国主义从精神上奴役与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它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动宣传。比如,协和会曾经通过举办电影、戏剧、讲演、开办讲习所和学院等,妄图使中国人民理解所谓“东方道德的真义和日满不可分关系的真髓。”“七七”事变之际,协和会在伪国都新京召开所谓“华北事变国民大会”,鼓动武装侵略中国,继而又派遣什么“日本军慰问使节团”。此外,还搞什么飞机献纳运动,等等。协和会还控制伪满的道德总会、回教总会、喇嘛宗教团、基督教会,等等。并且与各伪宗教团、伪慈善团体、伪金融、农业合作社等,开展所谓“民力涵养运动”,等等,大搞思想渗透。协和会的所谓“宣德达情”的职能,实质上就是作为关东军和伪满洲国的别动队,协助实施各项统治与掠夺政策。

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兵站基地的伪满洲国,太平洋战争后,经济统制日益加紧。在粮食方面,由于实行配给制,广大群众所能得到的粮食量很少,不得不从黑市交易中购取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于是,协和会便伙同经济警察,大抓经济犯,进行所谓扑灭黑市交易运动。通过协和会的全国协议会进行部署,要求会员全面协助官宪,完全取缔黑市交易,并加以杜绝。

此外,如掠夺农民的所谓“农业增产出荷运动”^①,强迫广大

^① “出荷”即强迫农民交售农产品。

工人效力的所谓“矿工增产运动”，榨取居民的每一个铜板的所谓“国民储蓄运动”，酷使青年和学生负担沉重劳役的“勤劳奉仕运动”^①，等等，都是由伪满洲国各级伪政权和协和会各级组织，以及有关日伪机构勾结起来干的。因此，逼“出荷”，抓劳工，催捐征税，收缴金属，替细菌部队强迫小学生捕捉田鼠，等等，都成了“协和运动”的组成部分。一九四三年一月，协和会制定了《战力增强紧急运动实践事项》，三月又制定了《协和会运动基本要纲》，极力“推进战时经济体制”，把强迫人民增产、储蓄、劳役作为“国民运动”的重点。例如，在搜刮人民金钱、强迫人民储蓄方面，一九四四年一月，在协和会全国会员大会上，专门做出了《战时紧急国民储蓄增强运动实践事项》的决议，全力推进这一运动。在日本即将战败投降的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协和会更加不遗余力，制定了《满洲帝国协和会行动纲领》，这是一个在彻底压榨中国人民的基础上妄图进行最后挣扎的行动计划。《纲领》由十五项组成，包括实行“生产邻保活动”，“根绝浮浪者”，“建设以生产为中心的防卫城市”，“邻保互励尽力完成战时国民负担的数量”，“努力创造明朗坚韧的战时刻苦生活”，等等。这一切，其涵意是不言自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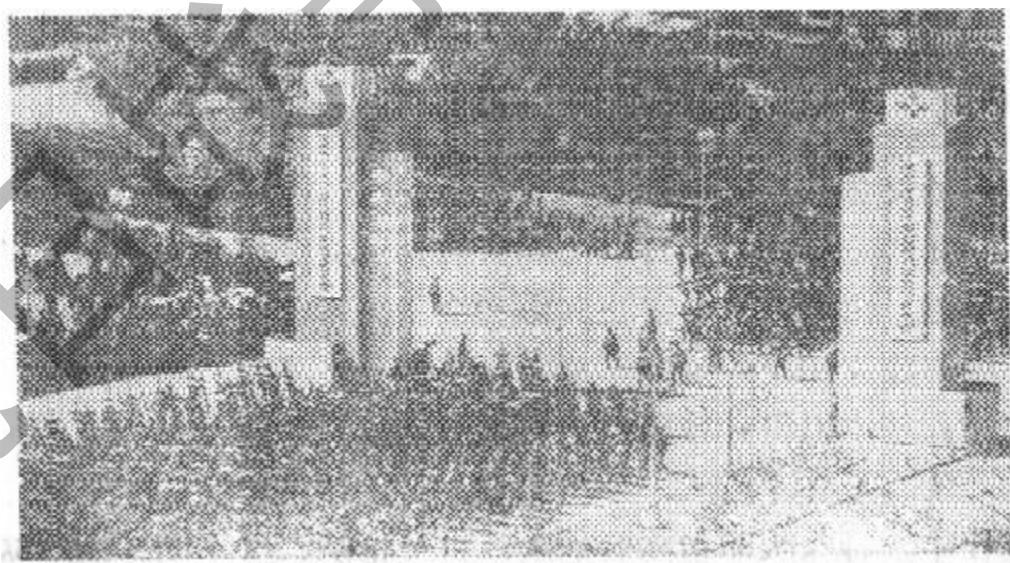
3 名副其实的法西斯党

一九三七年四月，协和会曾进行一次改组，日本大特务、伪满警察头子甘粕正彦任总务部长兼规划部长，古海忠之任指导部长。从此，协和会在“国民组织化”的方针下，日甚一日地加紧对中国人民进行法西斯式的控制和奴役。

^① “勤劳奉仕”即强迫从事无报酬的劳役。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八日，伪满民政部、军政部、蒙政部共同发布了《青年训练规定》。根据这一规定，青年训练由协和会进行。同年，协和会便设立四十八个青年训练所，对六千名青年进行训练。受训的是十六至十九岁的青年，除军事训练外，还进行关于街村、保甲制度以及课税等方面的训练。很明显，其目的就是妄图训练一批为殖民统治、掠夺政策服务的力量。一九三八年，全伪满洲国的县、旗、市又增加五十所青年训练所。每年训练二至三期，受训完了被派回原地。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协和会发布了《青少年组织大纲》。从此，伪满洲国的青少年全部统一在协和青年团和协和少年团之中了，并置于协和会的直接控制之下。一九三三年六月以来满铁铁道总局在铁路沿线奴役我国青少年看守铁路的所谓爱路青少年队，从一九三九年三月起，也并入协和青少年团之中，改名为协和青少年团爱路队。日本帝国主义通过青少年团对广大青少年进行训练与奴化，目的就是把青少年拖进青少年团又到自卫团再到军警的道路上去，为他们充当进行侵略和镇压的炮灰。



“协和会”召开的一次大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会对青少年的法西斯式的控制和奴役，更加变本加厉。从一九四一年起，协和会把对青少年的所谓“教化训练”作为协和会运动的着眼点之一。当年三月五日，作为协和会的下属机构，成立了青少年团统监部。到一九四〇年底，把五十六万多青年划入三千一百多个青年团之中；把七十四万少年划入三千七百多个少年团之中。到一九四一年，青少年团达一万个，团员达二百万人。特别在学校中，青少年学生都无一例外地必须是青少年团员。为了奴役广大青少年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协和会在“训练即活动，活动即训练”的口号下，迫使青少年修筑铁路、开垦农地、进矿挖煤、入厂“奉仕”，负担各种沉重劳役，并进行各种法西斯训练和军事训练。

协和会对成年人的法西斯式的控制与奴役也日益加紧。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四日伪满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建立协和义勇奉公队的法令。同年十二月，伪满洲国和协和会还共同宣布，协和义勇奉公队由协和会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协和义勇奉公队，迫使二十至三十五岁的青壮年，根据“义勇奉公”精神，担任平战两时“国民的警护”。这种组织，主要建立在伪满首都和大小市镇。在设有“奉公队”的地方不设自卫团；不设“奉公队”的地方，则以自卫团代之。所谓义勇奉公队实质上就是站岗放哨、维持秩序、劳动服务的义务队，人们称之为“棒子队”。

一九四一年三月五日，协和会特别设立了协和义勇奉公队中央总监部，由关东军参谋长和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任中央总监。省和县也都建立相应的组织。从此，全国三十多万“奉公队”员，分别编入基本组织和特殊组织之中。基本组织按一县一队的原则组成，设有总队、区队、分队、班、组，队员均为二十至四十岁的青壮年。特殊队即指高射炮队、机关枪队、汽车队、消防队、爱路队等承担特殊任务的奉公队，这种队大约共有一万二千名队

员。奉公队除了接受“精神训练”“技术训练”和“军事训练”外，还在“勤劳奉仕”的美名下，负担大量劳役。例如，一九四一年七月至十月，是关东军以特别大演习为名，加紧对苏战争准备时期，被征用服各种劳役的奉公队达三十七万人。除一般劳役外，有时奉公队还被征用从事各种特殊活动，如修理被破坏的工厂和道路，搞消防，通讯，看守铁路，等等。

协和会进行法西斯式的控制与奴役的对象，不只是青少年和壮年，而是所有的人民群众。一九三六年底，协和会的中央机构和伪满洲国的中央政权，已部分地实行“二位一体制”。一九四〇年，协和会和伪满洲国在领导机构方面，实行彻底的“二位一体制”。当年十一月十五日，“九·一八”事变期间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三宅光治，开始担任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与此同时，协和会与伪满洲国之间进行了人事大交流。从此之后，各地伪省长、省次长兼任协和会省本部长、副本部长，伪县长、副县长兼任协和会县本部长、副本部长。这实质就是伪满反动政权与法西斯式的政治组织的政党合一。这种关系，桥本虎之助的比喻是：“以脑为中心的神经系统是政府机关，是发号司令；以心脏为中心的血管系统是协和会，司体力营养的，两方面合起来活动，才能活泼发达起来呢，满洲国全体的情形，应当是这样。”^①这就是说，伪满洲国与协和会之间，已经从坂谷希一所说的表里关系，发展成为桥本虎之助比喻的脑心关系。与这种关系相适应，协和会在会员方面，也采取了“大众主义”的方针，即在城镇实行“市民即会员主义”，协和会分会组织与街道邻保组织统一起来。这样一来，不单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人员被迫成为协和会会员，就连街道的普通居民，也被包容在协和会的组织之中。农村稍有不

^① 伪新京特别市社会事业联合会：《新京社会事业》，第5页。

同。农村协和会组织是带有所谓“指导性”，因为农村协和会分会往往从事一些所谓“思想战”和搜集情报等活动，不便于把广大农民划入协和会的组织之中。但在农村也同样实行“二位一体”制，伪村长兼任协和会分会长。其目的也是妄图利用伪政权和反动组织两种反动政治力量，对广大群众进行法西斯式的控制与奴役。

强化对外围组织的控制，也是加紧控制群众的手段。“满洲国防妇人会”“军人后援会”“满洲空务协会”“满洲红十字会”“兴农合作社”“劳务兴国会”“商工公会”“能率协会”，等等，其中有的组织严格说来，并非是协和会的外围，但其活动也是通过协和会，或者是在协和会的参与下进行的。

4 民族离间政策

伪满政府和协和会表面上标榜民族协和、一德一心，实际上大搞民族离间和民族对立，破坏民族团结，妄图以分而治之的办法，实行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与掠夺我国东北，其罪责在于日本垄断统治阶级及其代表极少数的军阀和政客；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来到中国东北，有各种原因，目的也不一样，其中有许多是属于劳动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迫使下来到东北的。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出于侵略和掠夺的目的，极力用对外民族的侵略掩盖国内阶级矛盾，使日本民族在伪满洲国内处于优越的特权地位，从而形成民族对立。“九·一八”事变前，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把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头上，并采取造成既成事实的办法，使日本人在我国领土上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法令的约束与管辖。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人自称为伪满洲国的民族之一，并有大量日本人充当

伪满洲国的官吏，掌握伪满洲国的各项大权。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日本与伪满洲国之间签订所谓《关于日本国臣民在满洲国居住和满洲国的课税等条约》，同意一部分关于课税、经济等方面的伪满洲国法令也适用于日本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又签订《日本国与满洲国间关于撤销在满洲国的治外法权和转让南满铁路附属地行政权条约》。这一撤销治外法权之举，与其说是取消特权，勿宁说是扩大特权，并使之合法化。治外法权撤销后，日本人在司法、行政等方面仍保留事实上的特权。而且在教育、兵役、神社等方面根本不受伪满洲国法令约束。

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大搞所谓“日满亲善”，另一方面却极力鼓吹日本民族是富有优秀的质量和卓越能力，对其他民族进行指导、启蒙，居于领导地位的民族，并宣称“民族协和”也是以日本民族为“核心”的。因此，尽管在日伪的官样文章中也强调什么“宽仁谦让”，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所制造的日本人的优越感，不能不导致尖锐的民族对立。这种情况，早在伪满洲国初期，就引起少数日本人的忧虑：一个日本官吏的报酬等于同样工作的中国人官吏三至十一个人的报酬，不管有无技能，一切重要职责都由日本人占据，这是不利于统治的。^①这就是说，日本人的特权地位，过分到有碍于殖民统治了。但是，民族优越感是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变本加厉的侵略与掠夺，这种优越感，在日本侵略者身上必然是更加溢于言表，甚至作为行动的准则。协和会的头目之一，兼伪满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曾公然宣称：日本人“为数虽少，可是他们所牺牲的财力和人力，实在是相当大的，同时他们在心的智的方面所给的援助，

① 佐佐木到一手记：《满洲统治上的忧患》（1933.5.27）。《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一九七二年版，第857页。

也是值得我们记忆的。”“他们是站在现代文化最高峰的民族，所以立在指导地位，也是当然的。”他还比喻说：“譬如满洲国是一个人体，满系人（指中国人）是肉体，日本人是骨骼，没有骨骼，不能支持肉体，日本人是维持身体的重要部分，然而不能呈现在外部的，若是骨骼跑到肉体外边来，那就不好看了。”^①事实上，作为支持人体的骨骼的日本人，却经常跑到肉体之外。所以，桥本在文章中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现实：“在某一公园里，有一个日本人，犯了规则把自行车带到公园来，叫一个满人（中国人）园丁，看见质问了，可是那个日本人不但不受质问，反而夺去了园丁的竹扫帚把园丁打个落花流水。”^②在伪满洲国，中国人无故遭受日本侵略者欺压、打骂和凌辱乃是司空见惯的事。

对朝鲜民族，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也是很毒辣的。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关东军拟定了一个所谓《在满朝鲜人指导要纲》，其中提出要“扶持其履行义务的观念和勤劳精神”，并“迅即首先把握和培养其核心的领导阶级，并将各种现有民族团体，根据其性质统一在满洲帝国协和会之中。”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显然在于利用朝鲜的上层来奴役和剥削广大朝鲜族群众。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在朝鲜族中间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殖民地内实行的一种政策，在“日鲜一致”的口号下，培养一小部分朝鲜族的优越感，实行差别教育，照顾朝鲜族的中等学校的入学率，起用朝鲜族充当伪官吏，工资高于其他民族，配给方面也有照顾。这就不能不造成一定程度的民族隔阂。从一九四〇年起，“皇民化”运动搞得更加变本加厉。主要标志是，开始强迫朝鲜族人民群众改用日本姓名。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政策，一方面是妄图拉拢和控制朝鲜族的少数上层，一方

①② 伪新京特别市社会事业联合会：《新京社会事业》，第4—7页。

面极力压制和奴役广大的朝鲜下层群众。随着“皇民化”运动的积极推行，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族中间开始实行“征兵制”，许多朝鲜族青年被征入日本军队，替他们充当炮灰。总之，在“皇民化”运动中，广大朝鲜族群众并未获得任何好处，依然处于政治上无权、生活上牛马不如的地位。因此，尽管日本帝国主义极力制造民族差别，进行民族离间，朝鲜民族和其他民族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始终是站在一起的。

日本帝国主义对人口不到一百万、居住地区占整个伪满洲国领土三分之一的蒙古族的政策，也是煞费苦心的。一九三三年七月和一九三六年五月先后两次作出决定，即《对蒙古人的指导方针》。其基本精神是：维护原有的旧制度，继续利用蒙古的王公贵族对广大蒙古人民进行统治；同时离间蒙古族同其他民族的关系，并利用蒙古民族的懦弱性格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为此目的，在蒙族地区，特别设立兴安省，组成兴安军、兴安军区和兴安军官学校。后来伪满军改成所谓国军之后，蒙古人的部队称为第九军和第十军。这些部队，不仅在“九·一八”事变时期，被日本帝国主义所驱使，而且以后多次被驱使到各处进行征战。例如，在所谓呼伦贝尔事件、哈尔庙事件、察哈尔华北作战、诺门汗事件、伪三江省“治安肃正”、热河地区“治安肃正”等军事活动，都迫使蒙古人军队参加。特别在诺门汗事件中，蒙古族的军队遭到大量杀伤，大批士兵不堪忍受，纷纷逃脱日伪控制，离开战场，返回家乡。在伪满十四年间，蒙古民族，特别是中下层，和其他民族一样，一直遭受日本侵略者残酷压迫，多次遭到残酷的屠杀和镇压。

日本帝国主义歪曲和捏造中国的历史，胡说“满洲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挑拨满族与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关系。给满族极少数上层以某些特殊待遇。在奉天特别成立满族学

校——维城国民高等学校，专门收容清代皇族子弟，进行特别教育。另外，如伪满国军警卫连，均由满族士兵所组成，用以监视汉族士兵，防止暴动。

人数最多的汉族，被日本帝国主义视为劣等民族，各方面都受到差别待遇。在教育方面，汉族就学率极低；工资标准也是最低的。日本帝国主义公然污蔑广大的汉族群众“文化程度不算充足，还有种种缺陷”。